

橘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何朝霞
校读/肖应林

插画何朝霞

城墙有过束缚、摧毁，也有过慰藉，诗意长沙造城史就是长沙的历史。登上天心阁城墙，城上，手可摘星辰，城下，是至美的人间烟火。

作为一座现代化的特大城市，山水洲城长沙，依然还在以2000多年前的楚长沙邑城址为中心，沿着湘江两岸铺展、生长。

造城

范亚湘

整个汉朝，虽然临湘故城历经多次修葺、翻新，却未见过有过的增扩。不过，西汉中期，在今岳麓区三汉矶、西靠谷山，东临湘江，用夯土筑就了一座呈三角形的戍城即北津城，清朝同治《长沙县志》载，其“周迴八里”。东吴太平二年(257年)，北津城荒芜多时，为了阻止蜀汉袭扰长沙，东吴在今岳麓区麓街道黄鹄村一高台上新建了一座夯土城。背靠岳麓山，濒临湘江，长约1.5公里，宽约0.5公里，像一枚平箭躺在湘江之畔的橄榄，面积约为临湘故城的二分之一。

前后两次在河西建城，一东一西两座城隔江相望，像两个忠诚的战士，拱卫着湘江，守护着长沙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(220—589年)，长沙一会叫临湘，一会叫湘州；一会姓刘(备)，一会姓孙(权)，后来又改姓萧(道成)，姓陈(霸先)，像是每人都忙于争抢地盘称王称霸，哪有空来造城？

隋朝开皇十年(590年)，南越降隋，天下一统，长沙随即失去“边关”地位。隋、唐乃至北宋，政治、经济中心全在北方，即或“安史之乱”后北方人才、技术南移，长沙获得了一波红利，可那也只是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湘江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是否重视城市建设，显然与其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有关，长沙那时三者不占其一，如何令城市有所发展？

好在唐朝中期修通了一条途经长沙的南北主驿道，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从长安南行3130里到江陵，折东南570里到岳州(岳阳)，再南下550里到潭州(1260年)，然后经衡州(衡阳)、郴州，直通广东乐昌，全程6000余里。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这条“国道”和湘江水道一样，不但是政令传达、军事调度的生命线，亦是经贸流通、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，确保了长沙显耀的交通区位优势。

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经常可在古装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，一株挂着驿铺或驿站招牌的房屋静静地卧在古道边，道旁草木葱葱，闪耀的阳光下，远方尘烟飞扬，一匹快马奔驰而来，还未勒住马，来人便扯开嗓子高喊：“六百里加急……”这时，驿铺里便有驿卒紧急接过传递的物件，飞身跃上另一匹骏马，追风逐影而去。从唐朝始，湖南水陆总驿铺就一直设在今潮宗街一带，每天进出潮宗街的人员、车马络绎不绝。“江畔长沙驿，相逢缆客船。”诗人韦迢刺莆州(蒲关)路过长沙，就是从长沙驿热闹的人海中，一眼认出了好友杜甫。

肆

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)，金兵从江西进犯长沙，“围八日，登城纵火”。城陷，金兵焚城劫掠6日后撒腿北去。这可把往后几任潭州知州吓得不轻，李纲一上任就以长沙城太大，不利于守备为由，奏请将城墙截截掉三分之一，未准。下一年，折彦质知潭州，继续上奏，直到百余年后的景定元年(1260年)，才在知州向士璧的手上完成这一工程，即北城墙从北宋末年的开福寺以南南移到今湘春路一线，长沙城墙缩短至“十四里有奇”。至此，长沙城已基本定型，范围东接芙蓉路，南至城南路，西临湘江，北至湘春路，面积约为4.5平方公里，不及烈士公园的三分之一。

从烈士公园的三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，再到三分之一；从春秋战国一朝一夕地挨啊挨，终于挨到了南宋，这是一个多么长远的过程啊。都说从前车马慢，敢情从前长沙造城的速度比车马还要慢。

北宋元丰三年(1080年)成书的《元丰九域志》列举了6座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，潭州名列其中。宋室南迁，长沙战略地位凸显，人口更繁，商业更盛，游历长沙的南宋诗人张祁曾形象地赞咏：“长沙十万户，游女似京都。”

南宋长沙城布局冲破祖制，不再将里闾与官府分区。2011年，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上发掘出了一南宋街巷遗址。这条街巷残长47.5米，宽3.2米，两边是一栋紧挨一栋的房屋基址和整齐划一的青砖商铺地面，官衙、住宅和商铺鳞次栉比。2019年，在今黄兴北路和营盘路交会处东北角，同样发现了一处沿街百姓居所和商铺密布的宋代“街市”。

人口一多，用水量就多，可这似乎难不倒宋朝长沙人。本世纪初，在五一广场东北等南宋官府区和百姓里坊坡子街，开掘出了高规格的大型官修地下涵渠。这些网状涵渠相当于现在的“自来水”管道，源源不断地从湘江提水，将其直接输送到官府和百姓家里。

千年之前，长沙人就可以享用“自来水”，这不得不说奇迹。

南宋长沙隆盛还在延续，《元史·食货志》载，扬州千吨商船溯江“远及长沙”。身在扬州的马可·波罗见证了这些奇迹，在其《马可·波罗

文脉长沙

记》里将长沙划入长江沿线新兴商业大城市之一。这就不难理解，元朝诗人陈孚吟潭州之诗：“百万人家簇绮罗，从祠无数锦婆娑。”

明朝洪武五年(1372年)设立长沙国，潭王朱梓就藩，460多年后，长沙在继五代十国的马王之后又有新王了。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。”长沙城重新回到了王城规制，城中有城，城郭分立。这一年，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着手改造夯土城墙，城基全用条石码到8尺高，石基以上到女墙顶部皆用糯米灰浆黏合青砖砌成。

条石、青砖、糯米灰浆，怎么如此“奢侈”？可为了守卫王城，以求高枕无忧，这点投入又算得了什么？

城墙修整一新，坚城长沙“城池崇屹，甲于他郡”。其中，墙高2丈4尺高，周长2639丈5尺(折合8446.4米)，新圈进了伏龙山巅等几处高地。相较于南宋城墙“十四里有奇”，这次增加了差不多3里。城墙上设有4679个雉堞，每个高2尺。城西凭据湘江天险，其余三向绕以人工护城河，水面均宽6.5米。同时，开设了浏阳门、小吴门、正南门、德润门、临湘门、潮宗门、通货门、湘春门、新开门(后改为兴汉门)9个城门，对应城内一条正街。

成化十三年(1477年)，年轻气盛的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。明朝不乏一些奇葩的皇帝，诸如不许杀猪的朱厚照、沉迷炼丹的朱厚熜、“木匠皇帝”朱由校……或许吉王身上就自带皇室的那些奇葩基因，对于建筑格外倾心，如痴如醉。他仿照顺天府(北京)紫禁城官制扩建藩王府，工程浩繁，财费巨万”。新建吉王府“广袤若干里”，清朝《湘城访古录》云：“考明藩邸制，五殿三宫，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，城垣周以四门，堂库等室在焉。总官殿室屋八百间有奇，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。”

吉王和当年的马王一个德性，深谙享乐之道，在王府正殿后辟出一方官苑园林，用太湖石堆砌成高耸的假山群，“嵌空磊砢，石径逶迤”。假山群西面凿有万春池，水面辽阔，碧波浩渺。夕阳西沉，万春池里洒下一池金光，吉王领着一群官娥妃嫔，绕过水波，再沿盘旋的石径攀援至假山之巅，俯瞰长沙城内众生，得意洋洋地模仿李白的神态吟曰：“飘然乘云气，俯首视世寰。”

居，但有人居的地方必定要有水。《管子·小匡》曰：“处商，就市井。”从一个地方井的密度，就可以窥测到这个地方商业繁茂的程度，这也就是“市井”或“井邑”之说的来历。

其时，筒瓦和板瓦烧造技术已从中原传到南方，楚长沙邑里虽不见得建有高楼大厦，但多半应是砖木结构的瓦顶房屋，这和竹篱茅舍比起来，简直高大上太多了。而且，楚长沙邑四面环水，西临湘江，东、北不远处皆有浏阳河阻隔，南边龙伏山外是贯通浏阳河和湘江的湖泊沼泽，酃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，船官“北对长沙郡”，“湘州(长沙)商舟之所以次也”。只要在楚长沙邑外依山临水修建几处居所，自然易守难攻。

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载，越王无疆时，越国意与齐国交锋，齐国害怕楚国趁机打劫，遂派使者前去离间楚、越，曰：“复雠、庞、长沙，楚之粟也；竟泽陵，楚之材也。越窥兵通无假之关，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。”雠、庞在今株洲、衡阳一带，“无假关”在今汨罗一带，齐国使者巧舌如簧地游说，假如越国袭占了“无假关”，就可以南望长沙，深入“楚之粟”的广袤之境，楚国危殆也。

无疆无脑，经受不住齐国使者的怂恿，“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”。楚国分别从郢城和长沙出兵南北夹击越军，“大败越，杀王无疆，尽取故吴地至浙江，北破齐于徐州”。

经此一役，楚人愈加注重长沙，不断派遣武将文臣和贵族戍守，经略长沙。楚怀王时，上官大夫靳尚封于宁乡，湘江支流靳江因之得名。吴起变法后，楚国更为强盛，“席卷沅湘”，“南并蛮越，遂有洞庭、苍梧”，将近湖南全境和赣西皆被楚人揽入怀抱，长沙成为虎视赣西、湘南和湘西，回援鄂城的军事重镇，也是楚南实际上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被冠以“三湘首邑、荆楚重镇”之称。

万事起头难，凡事有个好的开始，往后必将越来越顺畅、精彩。楚人是长沙城的肇始者、奠基者，是他们筑牢了长沙城的根基。以后的长沙城建设，要么在楚长沙邑之处就地翻建；要么随形就势，以楚长沙邑为轴心不断地向四周拓展、壮大。如果把长沙城比作一个圆，那楚长沙邑就是圆心；如果把长沙城看作一个方形，那楚长沙邑就是两条对角线的交点，长沙城“历经沧桑不变位，遭尽磨难仍留名”。

东起今东牌楼、南阳街，西止今太平街、西长街，南始今解放西路，北止今中山西路，又一村。其中，东北角延伸至小吴门，西北角临近大西门。整座城呈南北向长方形，面积约1.5平方公里。不难看出，临湘故城已完全覆盖了楚长沙邑，且规模是其3倍之多。从楚长沙邑那颗小精灵似的菌种长成一朵硕大的蘑菇，临湘故城貌似已经很大了，其实面积也不过是烈士公园的十分之一，若是闲暇围着城墙散步转圈，一上午转个七八十圈不在话下。

《周礼·考工记》曰：“匠人营国……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。”临湘故城是长沙国王都，建设时必须遵循周礼，即宫殿的东边是祖庙，西边是社坛，前是宫殿，后为生活区。“八字衙门向南开”，宫殿、官署坐北朝南，南为前，北为后，《水经注》说，临湘“城之西北有故市”。

《水经注》又说，临湘县北有吴王家，“广逾六十八丈，登临写目，为城郭之佳憩也”。世人都说吴王忠，没错！可是，假设吴王不忠又能怎样？忠与不忠，藩王大多只是被封印在一座巨大城堡里的“金丝雀”，忧也罢，喜也罢；哭也罢，笑也罢，都断然不会出城。“楼高百尺倚云端，美景如画入眼帘。”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”无所事事，那就“登临写目”，对月吟诗，让所有的苦闷烦恼随着风，和皎洁的月光一道飘向远方吧。

西汉前元二年(前155年)，皇子刘发受封为长沙王。刘发也不讲究，因陋就简地住进了临湘故城。后元二年(前142年)，刘发回长安(西安)向父皇汉景帝祝寿。寿诞御宴进入高潮，狂歌热舞时，刘发只是“张袖小举手”。汉景帝怜爱其子，问其缘由，刘发答：“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”汉景帝听出了弦外之意，于是，大手一挥，将武陵(怀化、湘西一带)、零陵和桂阳三郡划归长沙国统辖。

刘发乐吗？乐！长沙国陆添三郡，何尝不乐。然而，乐中有苦，刘发只能苦中作乐！殊不知，汉景帝的这一“大方”，再次将长沙推到了阻截南越北上和威慑西南蛮夷的前沿。自楚、秦到汉，长沙一直都是征服和遏制南越的括弧两端，既是“秦时明月”，又是“汉时关”。车辚马，马萧萧，绵延不绝的大军从长沙开向南方，套用一句唐诗便是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巍巍南岭人未还。”

《晋书·卷十五》载，秦灭楚后“分黔中郡为长沙郡”。秦始皇二十六年(前221年)，借以湘水之名新置湘县(长沙)。长沙自此列入中原政权的行政区划，由楚国的一座城邑直接升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。阿房宫、秦直道、万里长城……似乎秦始皇特别对建筑上心，可他却偏爱搞那些供自己享乐和彰显磅礴气势的建筑，而对于长沙郡治“湘县故城”，只是随便在楚长沙邑的基础上稍作一些翻修、调整，敷衍了事。

“千古第一帝”秦始皇志不在治，而在开疆拓土。晚年，他强令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，戍五岭，启动征服南越的空前战争。这时，长沙既是前沿阵地，又是粮草等后勤基地，“湘县故城”外临时兴建了很多兵营、粮库，郡内亦开辟了好几条通往南越的“新道”“驰道”。

谁会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刘邦竟能掀翻“暴秦”？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，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，都城临湘县(长沙)。是王当然就要有像模像样的王府、宫殿。《水经注》曰：“临湘县故城……是城即芮筑也。”吴芮一到长沙，就开始建造长沙国都城即“临湘故城”。

1996年，长沙五一广场一工地上发现了西汉“安乐未央”文字瓦当和卷云纹瓦当，第二年，五一广场另一工地上挖出了东汉“府君高迁”文字瓦当、瑞兽纹瓦当和滑石质等建筑构件。倘若描绘古代建筑的精美，好像总离不开一个词：秦砖汉瓦。这是因为，秦时制作的砖上常画有米格纹、太阳纹等几何纹饰，而汉时烧制的瓦当上却绘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纹，有的还会写上吉祥之语。

“安乐未央”意为长久安逸、欢乐永不结束；“府君高迁”则为祝愿郡守高升。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知晓，五一广场那两处工地上的汉代建筑并非一般房舍，而是巍峨挺拔的王宫、官署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湘州郡廨西陶侃庙，云旧是贾谊宅……旁有一脚石床，才容一人坐，是谊宿所坐床。又有大柑树一。”太傅官署内流水、假山、绿树、鲜花和亭榭楼台等一应俱全，宛如仙境，难怪那只鸬鸟在贾谊宅内生活得“貌甚闲暇”。

别看临湘故城城垣高耸，日蔽浮云，却是用黏土夯筑。经考证，其城墙

不多在这同一时期，一个叫作熊绎的人，因其先祖之功，受封于荆棘丛生的江汉，始称楚，又称荆楚。熊绎是个有野心的狠人，率领族人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率领渠时，楚国“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”。楚国版图几乎每天都在翻新，已由一个“方圆五十里的小国”，雄起变为可以称霸南方的泱泱大国。

大国，有话事的份了。

楚国军队跨过洞庭，溯湘江进逼长沙。没费什么工夫，楚人便掌控了长沙，替代扬越人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。楚人盘桓长沙，并在此屯聚粮草，建立军事据点，向南，威逼南越；向东，越过九岭、罗霄山脉，染指赣西，与东南霸主闽越争锋。

长沙踞临湘湖之上游，西接黔中，南邻五岭，东交瓯越，与楚国之都郢城(江陵)南北呼应，是楚之南方天然屏障和战略要地。楚国在长沙大兴土木，百堵皆兴，拔地而起，肇造了一座城邑。长沙有城了，虽然不及三千年，可两千多年好远不假。

城即城墙，那时的城主要还是用于防御，说白了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军事堡垒。经考证，楚长沙邑东在现黄兴路与蔡锷路之间，南抵坡子街一带，西临下河街，北在五一大道与中山路之间，东西长约700米，南北宽约600米，面积约相当于今湖南烈士公园的三十分之一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只不过是一个“弹丸之地”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长沙旧城区改造，在五一广场片区发现了一个古井群，此中，有4口古井属于春秋战国时期。不见得有水的地方就会有人

再坚固的城墙也挡不住内乱的侵蚀，再富丽堂皇的宫殿也经不了火烧。

“多少遗官成瓦砾，无穷战垒聚锋芒。”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十月，张献忠拿下长沙，杀气腾腾地闯入吉王府，翻箱倒笼地一番搜罗后，学着项羽当年焚烧阿房宫的模样，一把大火将昔日金碧辉煌的吉王府化作了焦黑残垣……清朝顺治十一年(1654年)，长沙守将洪承畴觉得吉王府那些残留的砖头废弃了可惜，下令将其拆了加固、补缺长沙城墙。清兵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方才将吉王府拆卸得片瓦无存。

可是，哪怕是用吉王府之砖头加固的城墙，照样不能挡住内江军队的炮击。康熙十三年(1674年)二月，“逆贼吴三桂”兵临长沙城下，守城清军悍于贼军“兵锋甚锐”，主动献城。“石头城墙受不起几个开花炮。”毋庸置疑，时代已经不同了，作为“卫君”和军事戍防工事的城墙，面对坚枪利炮，俨然已失去了原初的意义。

有城墙和没城墙一个样，从此，清朝长沙官员对整修加筑城墙失了兴趣，长沙城墙像个弃儿，听凭其在风剥雨蚀中凋零、破败。

“南门到北门，七里又三分。”这首长沙童谣一直从明朝唱到清朝末期。查阅清朝乾隆十四年(1749年)《长沙府疆域图》和明朝崇祯十二年(1639年)《长沙府图》，清朝长沙城墙几无变化，只是将正南门改称为黄道门，临湘门、草场门分别改称为驿步门、潮宗门。

南宋淳熙六年(1179年)，辛弃疾知潭州，为了加速创建飞虎军营垒，曾组织囚犯到望城丁字湾采石，“以石赋罪”。后期，还利用麻石“广辟衢陌”。到了清朝雍正年间(1723—1736年)，连续几任长沙知府锒而不舍地对城区大小街巷进行了麻石路改造。先用条形麻石直铺固定两边路基，再将条形麻石光滑并凿有线槽防滑的一面朝上，一路横铺过去。麻石坚硬耐磨，若是雨后，斑驳陆离的纹纹尽显，细细密密，怪不得民间就传说“丁字湾的麻石五百年长一寸”。

长沙现存清朝修建的麻石街巷包括潮宗街、化龙池、金钱街等。冬日小雨，笃笃走在水淋淋的潮宗街上，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辙印，静静地刻在麻石之上，刻在老长沙人的记忆深处，那么分明，那么温馨。

清朝王达著《善化地理》载，仅善化“县治人口十万。贸易甚盛，尤以南门、小西门为最”。随着长沙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贸活动的频繁，尽管后期又凿了4座城门，依然不能解决日益吃紧的通行负荷。城墙已成累赘、羁绊，制约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1903年，长沙开埠，时常见“洋人”手端相机在街头穿梭、拍照，镜头里的长沙城墙已是颓垣断壁，有的沦为一条陋巷，有的树木参差披拂，杂草丛生。墙内，深宅大院，飞檐反宇；城外，拥挤低矮的房屋一直延伸到湘江边……城头像是被岁月遗忘的角落，杳杳杳杳满是秽物。

更有一张照片显示，荒凉的长沙城墙上稀稀拉拉地植立着几根电线杆，一位头戴礼帽、身着束腰连衣裙的时尚妇人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擎着遮阳伞，站在一个女墙残口前聚精凝神地眺望远方……是啊，远方是一片多么辽阔的世界，何曾不是心灵深处最真挚的憧憬？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城，以盛民也。”“市，买卖所之也。”城就是城市，是一个大型的人类聚居地，同时也是一个浩大的市场。“民，乃城之本也。人心往之，城必兴焉。”不必纠结、感怀，人兴城兴，唯人才是城市的主体，一座以人为本的城市无界界限。

城墙“高高低低，弯弯曲曲，商业上、交通上，诸多碍事”。拆除长沙城墙势在必行。

1933年10月1日，长沙成为积广州之后全国第14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，城区面积达到48.5平方公里，是烈士公园的3倍有多。为了给现代交通规划让路，长沙城墙开始了规模化拆除，经过有识之士的反复呼吁，方才留下一段天心阁城墙。“阁上九霄迎日月，城留一角看江山。”今天耸立的天心阁城墙，是人们感知长沙漫长历史变迁中的一个耀眼坐标。入夜，登城“打卡”的人们照来攘往，城上，“手可摘星辰”，城下，是至美的人间烟火。

城墙是一座城市的纪念碑，它不仅仅是一面墙，而是“秩序的边界”，是一种象征、一个标志。不可否认，城墙虽然束缚了人们的思维、行动，却也曾给人们带来过心灵的慰藉和缠绵的诗意。

犹如人心，今天的城市再也不可能以墙断隔，只会越来越畅泰、亮敞。

作为一座现代化的特大城市，山水洲城长沙，依然还在以2000多年前的楚长沙邑城址为中心，沿着湘江两岸铺展、生长。